

认同与疏离

美国华裔流散文学批评
的东方主义视野

陈爱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认同与疏离

美国华裔流散文学批评
的东方主义视野

陈爱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同与疏离/陈爱敏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 - 7 - 02 - 006317 - 8

I. 认… II. 陈… III. 华人 - 文学研究 - 美国
IV. 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0499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认同与疏离

Ren Tong Yu Shu Li

陈爱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ISBN 978 - 7 - 02 - 006317 - 8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陈爱敏博士的专著《认同与疏离》马上就要付梓了,我虽然身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研究讲学,但依然为昔日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高兴,因而不得不遵嘱为本书作一小序。

虽然本书所讨论的流散现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但众所周知,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大规模的移民潮致使流散现象越来越突出,并日益成为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流散写作伴随着流散现象的出现而来,因此对流散写作的研究也成了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的一个重要课题。流散现象的出现及流散写作的兴盛导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和语言的裂变:一个流散作家具有多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已不足为奇。在一个身份“裂变”(splitting)的全球化时代,一些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也经历了这种“裂变”的过程:曾经作为大英帝国的母语的英语曾几何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它一方面大规模地拓展其疆界,向其他非英语国家渗透,另一方面它本身也陷入了一种“身份危机”,英语的裂变导致了复数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或“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的出现,客观上为一种文学史写作的新方向——以语言为疆界——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这一切现象的出现都与“流散”这一课题密不可分,而考察和研究华裔流散文学则应当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学者关注的一个新的理论课题。

本书作者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下集中讨论美国华裔文学,并

把焦点对准这样五位在英语文学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华裔作家：早期成名的黄玉雪，后来者居上并迅速进入主流学界的汤亭亭，以其独特的题材异军突起的谭恩美和桀骜不驯、不断发出不同声音的赵健秀，以及近几年内成名并迅速地同时得到读者大众和学界认可的哈金。如果说前四位作家在国内已有不少人（包括同样在我指导下的博士生）作了研究，那么在本书中专章讨论哈金则在中文语境下属首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爱敏能充分利用在美国访学的机会和哈金接触，并对他进行了访谈，从而使国内的读者和研究者对这位始终“隐而不露”传奇般人物哈金有了直接的了解。应该说，这正是本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所在。就在本书作者已完成初稿时，哈金于二〇〇六年成为华裔人文学者和作家中极少数当选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这也说明作者的理论敏感性和前瞻性。这同时正是我一贯勉励自己并鼓励我的学生努力去做：既要研究那些已经成名甚至成为经典的作家，同时也要具有前瞻性地研究那些本身具有研究价值并有可能在未来越来越有价值的作家。

我们今天在阅读那些华裔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读到其中隐匿着的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越（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目前开始引起学界瞩目的“民族记忆”（national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研究已经在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语境下取得了一些成果,而把目光关注于流散现象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在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华裔流散作家及其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他或她们的创作实践引起了主流文学研究者的瞩目,对文学经典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挑战作用,使得中华文化和文学率先在西方主流社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在这些成就中也暴露出不少缺陷和局限性,对此本书作者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对之进行了分析批判。当然,这些华裔流散作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不仅仅只是离开祖国并散居海外,其中有些人近似流亡状态,而有些则是自觉自愿地散居在外或流离失所。他们善于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来于居住国和文化母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并且熟练地使用世界性的语言——英语来写作,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使我们感到欣喜的现象是,这些华裔流散作家的写作已经同时引起海外汉学家和主流文学史家的重视,并被认为对重新书写文学史和重构文学经典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面对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的“越界”行为,我们对国别文学史的书写是不是也受到了某种挑战?如前所述,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流散现象的出现已经导致了语言疆界的模糊,这种语言疆界之拓展已经给文学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带来了新的可能。毫无疑问,流散现象实际上早已对英语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产生了影响,国际英语文学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这一新的以语言来划分文学疆界的趋势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撰史领域内就已出现,而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思

潮的再度崛起则对此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虽然本书主要讨论的是用英语写作的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但同样,我们也不可忽视另一个逐渐凸现的现象:汉语作为一种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语言,并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裔流散作家坚持用汉语写作,我们是否也可以以(汉语)语言为界限来重新书写一部中华文学的历史呢?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当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的思考。我想,本书在这方面所起到的开拓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来。

王 宁

二〇〇七年十月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一 流散诗学与后殖民批评	1
二 认同与流散文学书写	9
三 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	14
第一章 美国华裔文学概说	18
一 华裔文学形成的历史回顾	19
二 文化身份与母(父)女关系	22
三 文化语境与新移民文学的书写与接受	28
四 电影、戏剧及儿童文学中的“文化原型”	30
第二章 美国华裔文学与“东方主义”	32
一 新老“东方主义”和西方殖民话语	32
二 华裔文学中“东方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39
三 对抗与对话	57
第三章 原始的“他者”	63
一 原始、怪异的“他者”	65
二 残忍、野蛮的“他者”	71
三 饮食·性别·种族	76
第四章 美国女儿眼中的中国母亲	84
一 身份·困惑·疏离	84
二 专横的“他者”	91
三 不贞洁的“他者”	103

四	模糊的“他者”	106
五	落后的“他者”	113
第五章	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116
一	敬祖与敬神:孰是孰非?	118
二	五行说:科学还是迷信?	124
三	鬼神、巫术:科学与伪科学?	129
四	风水说:理性还是非理性之说?	134
第六章	被“阉割”的“他者”	141
一	美国公民身份与新老“东方主义”	142
二	大众传媒中的华人男子形象	145
三	女性化了的“他者”	148
四	被“阉割”的“他者”	154
五	“同性恋”“他者”	157
第七章	颠覆“东方主义”	162
一	华裔作家群落的激愤与呐喊	163
二	打破基督神话	172
三	颠覆西方殖民话语	175
四	寻找理想的“父亲”	185
第八章	共谋的异国情调:谭恩美儿童文学作品的背后	192
一	“古老”的东方呈现	192
二	文本、图画、媒体的背后	196
三	“东方论述”、“西方论述”和“自我东方论述”	203
第九章	语言混杂和身体诱惑:表征与反表征	205
一	表征和美国华裔文学书写	205
二	语言混杂和动物意象	208
三	身体和身份	221
第十章	流散与反思:新移民作家哈金及其作品	229
一	生存与写作	229

二 哈金的书写策略	241
三 流散身份和文学书写	265
结 语	272
哈金访谈录	278
附 录	284

绪 论

一 流散诗学与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主义批评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的重要文化批评思潮。随着批评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全球化文化与身份的混合与认同,追踪殖民遭遇的后民族解读。在分析殖民者与后殖民者的相互渗透与紧密关联方面,“族裔散居”这个术语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随之,流散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也成为文艺界和学术界追踪的热门话题。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大家斯图亚特·霍尔对“后工业”和“后现代”等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挑战。他“全面提出了现代性认同政治批判,提出了系统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在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全球化理论之间开辟了新的殖民理论空间。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霍尔从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宏大视野介入后殖民理论话语,凸显后殖民族裔散居主题。另一方面,他又立足后殖民理论立场,为后现代、全球化、现代性等宏大叙事批判注入了新的活力。”^① 此举为后殖民族裔散居理论的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有力的支点。

族裔散居是移民、流散的自然结果,而当今流散者批评的兴起

① 陶家俊:《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3页。

实际是后殖民批评的延续。流散一词来自英文 diaspora。它的含义和解释也耐人寻味,字典中对这一词条的解释也极为丰富:1. 指大流散:从公元前六世纪被驱逐到巴比伦起直到现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以外的分散状况;2. 指海外犹太人聚居区;3. 指任何民族的大移居;4. 指同一个种族整体的分散状态,如文化和语言等。^① 由此可见,英文的 diaspora 折射了犹太人受到种族歧视、丧失家园、四海为家的漂泊的历史,反映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移民浪潮,使得“民族、国家概念日益不确定和民族文化身份日益模糊”的现状。^② 对 diaspora 的翻译到目前为止也有很多版本:流散、流亡、离散等,而且这些翻译都有一定的道理。目前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英语系与亚裔美国研究系执教的凌津奇教授倾向于将其译成“离散”,因为其中包含了离开祖国而散居海外之意。^③ 而清华大学王宁则认为应该翻译成流散,他在论及究竟是离散作家还是流散作家时曾指出:这些作家“不仅仅只是离开祖国并散居海外,他们中的有些人近似流亡状态,有些则是自觉自愿地散居在国外或者有意识地流离失所。这样,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来于居住国和自己的出生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因此,我认为,将其译作‘流散作家’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异国他乡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熟练地使用世界性的语言——英语来写作,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

① 参见:《美国传统英语大词典》,第四版,波士顿 纽约:豪格顿米夫林公司,2000年。

② 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③ 另参见凌津奇的论文:《离散三议:历史与前瞻》,《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111页。

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①我更赞成后者,因为它更能全面地表达流散者的流动状态和游离身份,因此,在本书当中我一律采用“流散书写”来指代美国华裔文学创作。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无论是“流散”还是“离散”,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可忽视,因为它掩盖了一种权力与政治关系。尤以西方社会而言,例如美国“离散一词并不能用来概括美国历史上大规模贩卖黑奴、逼迫印第安人长途迁徙、迫使中国移民颠沛流离、将日裔美国人强制性地重置,以及对大批无家可归的城市游民不闻不问的本质。”^②像美国这样“现有的流散模式善于表现文化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但难以准确描述美国少数族裔的实际错置经历与社会及政治霸权之间的关系”^③。可以见得,在“放逐”、“流亡”、“流散”或曰“离散”之中包含着很深的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等因素。

流散者批评作为后殖民主义之后出现的另一批评思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初露端倪,一九九一年一本专门研究流散现象的杂志《流散者》创刊,它试图瞄准“流散者”研究,把自己划归一个新的理论领域。随之出现了一大批理论家:卡锡克·托洛彦、苏德西·米十拉、维杰·米十拉、伊恩·钱伯斯等。^④对于流散者的定义有很多。卡锡克·托洛彦用这个术语来称呼“跨国时期典型的共同体”特殊的“社会形式”。^⑤他这样界定是将此限定在全球化时

① 王宁:《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特征》。

② 贝尔·胡克斯:《黑人相貌:种族与再现》,波士顿:南端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③ 艾模尔德·克鲁普特:《种族批评,民族志学,历史,文学》,伯克利: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2—123页。

④ 参见:《文学理论精粹读本》,阎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6—362页。

⑤ 卡锡克·托洛彦:《民族国家和它的他者》,载《流散者》,1991年第1期,第3—7页。

期到来的跨国经济、劳工输出,以及文化生产的跨国化等现象出现的暂时时期,以区别于前现代和古代的“民族迁徙”,即历史上的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群体的大规模分散,或者是人们常说的“民族流散”。沃克·康纳则笼统地将流散者定义为“居住在祖国以外的那部分人”。不过,有人认为这样划分过于简单化。我很赞成威廉·萨弗朗的定义,他的划分消除人们头脑中传统上对于流散者带有隐喻的描述:流放国外者、开除国籍者、政治避难者、侨居他国者、移民和并非全是“少数民族的种类”^① 这个概念对我们研究流散文学和界定流散身份很有帮助:

1)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曾经从一个最初特定的“中心”分散到两个或更多“周边的”或国外的地区;2)他们保留着与自己最初的祖国有关的记忆、幻想或者神话——其自然位置、历史和成就;3)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也许不可能——被自己客居的社会完全接受,因此感到部分地与那个社会疏离和隔膜;4)他们认为自己祖先的祖国是自己真正的理想的家园,是他们及其后代最终要(或应当)回归的地方——在条件合适之时;5)他们认为自己应当集体投身于维护和恢复自己最初的祖国,投身于它的安定和繁荣;6)他们不断单个或替代别人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与祖国保持联系,他们的民族共同意识和团结被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极大强化了。^②

萨弗朗所列出的这六大特征着重强调了流散者与祖国的关系问题。但是随着全球化时期的到来,有很多人:商人、知识分子、律师、劳工等自愿地在其他国家流散周转,自我放逐。他们不必依附

① 威廉·萨弗朗:《现代社会中的流散者:祖国与回归的神话》,载《流散者》1991年第1期,第83页。

② 同上:第83—84页。

或者脱离祖国和居留国的大宇宙中心,他们通过参与“文化形式、亲缘关系(和)行业协会”或使自己依附于宗教团体和城市,可以创造小宇宙联盟。^① 萨弗朗和克利福德对流散者的界定,为我们在更广泛意义上认识什么是流散文学书写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流散者的认同意识——依恋祖国、回归本土、追寻民族认同,或积极认同“世界历史的文化和政治力量”——提供了解释。

爱德华·赛义德^②、霍米·巴巴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评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秉持着流散的世界主义阐述与批评视角,也都极为推崇知识分子的游移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流散经历和身份使然。巴巴认为正是殖民主义导致了战后的“无家状态”,促生了前殖民地移民一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散居概念在思想上是矛盾的、文化上被“污染”的流亡者、流散者或者普泛的移民形象身上得到典型的反映,这种骚动不安的形象总是彷徨于祖国与移居国、原文化与移居国文化之间。焦虑与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挣扎与痛苦是移民最好的心灵写照。^③

我们还应该区分“流散”和“流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流亡的贬义是明显的,而且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表现出一种被动与无奈。而流散则更呈现一种中性,有时带有自觉意识上的自我放逐,它可以是主动也可以是被动的。爱德华·赛义德对流亡有切肤之痛,研究得也相当深刻。在《知识分子的流亡》一文中,赛义德指出: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

① 詹姆斯·克利福德:《流散者》,载《文化人类学》卷九,1994年第3期,第305页。

② 全书中 Said 我译成“赛义德”,出现在其它出版物中则保留原来的译法。

③ 生安锋:《后殖民主义“流散诗学”与知识分子》,载《思想文综》,第9期,第153—154页。

惩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患者、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块。^①

由此,我们看到历史上人们对流亡者的看法,其中,所含贬义就不言自现了,因为,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流亡者经常与道德败坏者、身患传染病者为伍。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是政府惩罚或者限制的对象。在《知识分子的流亡》一文中,赛义德还给这篇文章加上了副标题:“放逐者与边缘人”。流亡者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始终处于权力和主流话语的边缘。他们有家不能归,有亲人不能团聚,处于永远的流浪状态。因而,他们的命运是凄苦的。赛义德强调指出:“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可望不可及。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②

但是,随着经济、文化、商业等的全球化,流亡与流散几乎成为同一概念。它的政治性开始淡化,渐渐成为一些作家、学者、音乐人等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有些作家和学者自愿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一个新的国度,生活在主流文化的边缘,以寻求一种边缘化的视野。用霍米·巴巴的话说,在一种被漠视的状态之中,得到一种教益,一种超越诸如中心和边缘、都市主义和边际状态、东方

①② 爱德华·W·赛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4页。

与西方两极间的对立,从中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与胸怀。^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散成为流散者积极的生活体验。因此,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现代化的交通和网络传媒等多种手段的出现,流散者不再感到孤寂,也不完全依恋故土。意志坚强的流散者以四海为家,赛义德、巴巴、斯皮瓦克等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拒绝任何本质主义的文化认同观,把精神上的漂泊当做知识分子理想的家园,出入于多种文化而不属于其中的一种。因此,流散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姿态”。“流散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它必然带有一种与母体艰难撕裂的伤痛和被抛入文化间隙地带的凄冷寂寞;但是这种局外人,身处圈外的状态又给流亡者提供了一种特权,一种优势,一种思考问题与看待时势的双重视界。”^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改变,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量的青年和学者等走出国门来到美国。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到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国内又掀起了一股新的赴美“淘金”热。这股热潮的掀起,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国内外政治气候使然。“文革”结束,中国领导人总结历史经验,打开国门,给那些一心希望到国外去闯一闯的年轻人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一些本来在国内自觉压抑的知识分子正好利用这个机遇,力图到西方那块“自由”的乐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因此,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又有一大批从大陆出发的新移民来到了美国求学和创业。他们历尽艰辛,追寻自己的美国梦。的确,大多数新移民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洋学位,找到了收入不菲的工作,成了有名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但是他

① 霍米·巴巴:《一种全球尺度》,清华大学“后殖民主义讲坛”上的讲演,2002年6月。

② 生安锋:《后殖民主义“流散诗学”与知识分子》,载《思想文综》,第9期,第164页。